

我国人口经济发展的测评系统研究

洪 英 芳

内容提要: 本文对现阶段我国人口经济发展测评系统的构建进行了探讨, 认为现代人口转变、人口素质与人力资源开发、经济增长质量以及生活质量是决定人口经济发展进程与水平的基本要素和主要标志。以上述四大要素的指标体系为基础设计了我国人口经济发展的测评系统, 又进一步阐述了该测评系统主要指标的设定标准、测评指标与国际接轨以及该测评系统的应用条件等问题。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人口经济发展也已开始进入新的转变时期。新的矛盾不断出现及其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突出, 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了及时反馈人口经济发展急剧变化中的重要信息, 就必须对它的进程与水平进行具体评估。为此, 全面分析现阶段影响我国人口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 并构筑科学而易于操作的评估系统, 便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课题。

一、人口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

人口经济发展是由许多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具体因素决定的。为了准确把握它的发展进程, 就必须具体研究和把握决定其发展进程诸多因素中的若干基本要素。笔者认为, 以下四个要素是对现阶段我国人口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基本要素。

1 现代人口转变。它的进程和水平是制约现阶段我国人口经济发展进程的基本人口要素。而且, 这一转变进程越快, 产生的发展效应一般也越大。在现代人口转变中, 以下三个人口因素的作用很突出。一是人口生育能力的变化。它是现代人口转变的基础。一般它是通过人口政策、社会经济机制的综合作用, 使人们生育意愿在子女的数量和素质方面逐渐作出倾向后者的选择, 从而使人口生育能力发生历史性的转变而逐渐下降。二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它决定着人口自身的转变。由于人口生育率的下降, 使少儿人口比重降低, 逐渐使生育年龄妇女规模发生变化, 结婚人口比重下降, 妇女年龄别生育率以及生育高峰期的年龄分布都将发生变化。三是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它是支持人口低增长和加速现代人口转变的重要前提。由于平均初婚年龄提高能明显减弱年龄结构的惯性对人口增长的压力, 能一定程度上消除人口自身增长所带来的生育高峰, 这一因素直接决定多一代人还是少一代人的问题。

2 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源开发。它是当代人口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它的进程和水平从根本上决定着人口经济发展的总进程和基本方向; 它是最终决定人口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它不仅是每个人自身不断提高知识、技能和整体素质的过程, 更重要的还是把这些新知识、新技能不断创造性地应用于实践和转化为新的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人力资源开发与其他发展因素的本质差异在于它是人口经济实现持续发展和不断增强活力的根本前提, 并对现代人口转变、

经济增长质量以及人口生活质量等主要人口经济发展要素都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这就客观地决定了它在整个人口经济发展的主要要素中,处于最具决定性作用的特殊重要地位。从本研究课题的特定角度来看,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文化技术素质、妇女文化程度的相对水平,以及国家、企业对教育培训投入的规模、水平及其实际成效,是决定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源开发水平的主要因素。

3. 经济增长质量。它重点考察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是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口产业结构优化实现的。这是人口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因为经济增长质量对人口数量、质量、人口产业转移、人口流动、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变化都有重要影响,而且可以说,没有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经济发展;只有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提高,才会带来高度的人口经济发展和一系列根本性变化。因此,它是表明人口经济发展进程和水平的重要指标。研究表明,经济增长质量主要取决于:(1)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及其提高的速度;(2)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3)人口产业结构的转变特别是非农业化的进程;(4)人均GNP达到一定水平所需时间等因素。

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及其提高的速度,特别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决定因素。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是发展的根本的动力。技术进步可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它也是管理水平与政策导向的反映。劳动力的科学管理、组织、分工、协作,以及科学利用资源等都可使劳动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高。

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主要用来考察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是靠各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长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改变的主导因素。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差异本质上就是劳动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才能保证不断增强经济增长的后劲和实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度与人口产业结构的转变水平,共同构成经济增长质量的核心内涵。

人口产业结构非农业化的进程及水平,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性结构因素。它与经济效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最为密切。人口产业结构的转变是以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以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基础。它既是现实生产发展的结果,又是对经济发展水平一种更直观的反映。就业结构的转换慢于产值结构的转换,更能本质地反映产业结构的转变。人口产业结构的非农业化,表明劳动力人口实现了从生产率低的产业向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的过程,标志着生产率高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也说明国民生产总值中附加价值的含量增高。此外,人口产业结构现代转变,标志着社会的多方面的发展,标志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城市化的发展,以及脑力劳动、技能劳动力比重的上升等。

人均GNP达到一定水平所需的时间,也是反映实质性经济增长的指标,使我们可以透过较长时期的增长来观察其发展。用国际比较的方法观察人均GNP达到一定水平所需的时间,还可帮助人们跃出只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一个难以标志经济发展水平的误区。

4. 生活质量。生活质量的提高是人口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结果。生活质量提高的进程及其所达到的水平是人口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通常可用收入、健康、安全、福利、环境等方面的改善来表示生活质量提高的程度。在本文所研究的人口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它集中表现在婴儿死亡率、成人识字率、恩格尔系数、城市化水平及分配的平等程度、贫困人口减少程度等的变化上面。

恩格尔系数,即食物消费在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它可以较准确地反

映这个时期人们物质生活消费水平和富裕程度的变化方向。恩格尔系数越低,说明消费水平越远离贫困线。它反映了每个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与享受需求、发展需求的相对均衡水平。当消费水平低时,恩格尔系数常常稳定在较高水平上,当消费水平提高时,用于发展消费和享受消费的比重就会大大增加。

贫困人口比重下降的程度,决定着平均生活质量的提高水平。贫困人口的大量存在是同失业、人口素质低下、妇女地位低以及长期的低生产率等密切相关,所以贫困人口的变化趋势反映了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的总趋势。通常的经济增长,一般不会自然消除贫困,特别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收入增加主要向中、高收入阶层倾斜,所以贫困人口收入变化情况对发展水平的价值判断具有重大意义。

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是生活质量的又一重要标志。如果实际分配两极分化严重,即使经济高增长,也会相对降低实际生活质量。假定某地区人均收入提高很快,但如果只是少数人超高收入猛增的结果,大多数人只享有这个平均值的极少部分,那么更多的人在经济高增长中并没有获得多少收益。而且,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越大,收入分配的平均增长幅度的社会效益差异也越大。例如一个低收入比一个高收入的人,其收入每一幅度的增加值获得的社会效用要高得很多。对于一个月收入 200 元与月收入 2000 元的人相比,每增加 100 元的效用有很大差别,收入 200 元的人当收入提高 100 元,可能会挽救一个失学的孩子。而收入 2000 元的人增加 100 元,只不过是进大饭店的一次小费而已。这种差异,使我们认识到,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提高,具有更大的发展意义。因此,不应单纯推崇一般的经济高增长,而是要致力分配相对公平的经济高增长。当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使贫困人口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幅度超过高收入阶层,才能真实地表示出发展的实绩。

二、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

战后亚洲特别是日本及东亚部分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时期,特别是在其人均 GNP300-600 美元的发展阶段,人口经济发展都发生了一系列规律性的变化。我们根据这些历史资料和数据,以及我国 90 年代中期的现实资料为基础,作成了亚洲多国模型,用以作为测定我国不同地区人口经济发展进程与实际水平的指标系统。它既充分吸收了东亚国家(地区)的历史经验,又反映了现阶段我国的实际。这个人口经济发展综合测评系统,由以下相互联系的四个子系统构成:(1)现代人口转变测评系统;(2)人口素质与人力资源开发测评系统;(3)经济增长质量测评系统;(4)生活质量测评系统。

(1)现代人口转变测评系统。该子系统主要由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出生率、总和生育率、少儿人口比重、平均初婚年龄等几个指标构成。它是测定人口经济发展中,人口自身实现根本转变进程及其水平的子系统。它标志现代人口转变的一般水平。根据我们对多国模型的分析,各国人均 GNP 在 300-600 美元的发展阶段,现代人口转变的上述各项指标都发生了规律性的变化,各项主要指标的最佳水平和下限水平如表 1 所示。这个差距真实地反映了亚洲各国及地区这个阶段现代人口转变进程的现实不平衡性。例如,这个阶段现代人口转变最快的国家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已降至 0.9%,总和生育年降为 2,少儿人口比重为 22%,而转变进程最慢的国家则分别为 2.1%、3.6 和 31%(见表 1)。这就是该阶段不同国家现代人口转变中量的最大差距和最大变动空间。如果一个国家转变进程较快,其主要指标就会接近前者;反之,就会趋向后者。因此,它可以成为测定我国现阶段人口转变进程与水平的一种客观标准。

表 1

现代人口转变指标体系

指 标	亚洲多国(地区)模型 [*]	
	最高水平	下限水平
1.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0.9	2.1
2. 出生率(‰)	17.2	29.0
3. 总和生育率(人)	2.0	3.6
4. 少儿人口比重(%)	21.9	31.0
5. 平均初婚年龄(岁)	25.8	21.0

^{*}“亚洲多国(地区)模型”是指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个发展较快的国家(地区),在其人均 GNP300-600 美元阶段现代人口转变进程诸指标的两极状态。以下各模型的国别等内涵同此。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4—1996 年各年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日]《东洋经济统计年鉴》1977 年版;《1950—1978 年世界人口与经济发展统计汇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0 年出版。

(2)人口素质与人力资源开发测评系统。该子系统主要由中学入学率、25 岁以上人口受中等以上教育的比重、人口平均文化技术综合指数、妇女中等文化的相对指数、教育经费占 GNP 的比重等 5 个指标构成。它揭示了人口素质提高与人力资源开发状况及其同人口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根据亚洲多国模型的实际资料分析,我们把上述 5 个指标上、下限具体量化为表 2。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指标的规律性变化,其变化幅度中学入学率一般为 55—47%,25 岁以上人口受中等教育的比重为 30—70%,教育经费占 GNP 的比重为 2.2—4.4%(见表 2)。其一般规律是,人口经济发展快的国家一般都接近最高值,反之,则趋近最低值;这个阶段的前期,多数国家接近相对低值,后期一般则趋向高值。因此,它也可成为现阶段我国测评人口素质与人力资源开发相对水平的重要座标。就每一个具体指标而言,也可测定当时我国该项指标所达到的相对水平。例如,根据世界银行发表的数据,我国中学入学率 1993 年为 55.5%,就可知按可比口径计算,当时我国该指标与其他亚洲国家相同发展阶段相比几乎处于最低水平上。

(3)经济增长质量测评系统。该子系统是由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速度、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非农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人均 GNP 从 300—600 美元所需要的时间等指标构成。它是测定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的物质基础能力及其发展活力的系统。也是从资源的利用程

表 2

人口素质与人力资源开发指标体系

指 标	亚洲多国(地区)模型	
	最高水平	下限水平
1. 中学入学率(%)	74.0	55.00
2. 25 岁以上人口平均受中等以上教育比重(%)	70.0	30.00
3. 人口平均文化技术综合指数 ^①	16.6	2.69
4. 妇女中等文化水平的相对指数(%) ^②	98.0	39.00
5. 教育经费占 GNP 的比重(%)	6.0	2.20

注:①人口平均文化技术综合指数:指人口中的中学入学率加上五倍的大学入学率以及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作用。

②妇女中等文化水平的相对指数是指男性为 100 的女性中学入学率。

资料来源:同表 1。

度、现代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观察经济增长质量的系统。该系统能敏感地测定出效益低的生产对人口经济发展的巨大的负面作用。我们通过对亚洲多国(地区)模型中各指标的研究与具体计算把上述几个指标最高值和最低值具体量化为表 3。该指标系统反映了这个阶段上述几个主要指标实际达到的总水平及各指标水平的差距。如果用它作为座标测评一个国家或地区相应发展阶段的现实水平,就可以相对比较准确地找到它的这些主要指标所处的位置与相对发展水平。例如,我国在这个阶段后期的 1994 年(人均 GNP530 美元),《世界发展报告,1996》非农业产业就业人口为 48%,已经达到该阶段的中上水平。

表 3 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

指 标	亚洲多国(地区)模型	
	最高水平	下限水平
1. 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14.10	5.02
2. 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83.50	58.00
3. 非农产业就业人口比重(%)	67.00	30.00
4. 人均 GNP 从 300—600 美元所需时间(年)	3	16
5. 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美元/人年)	3050.00	1830.00

资料来源:同表 1。

(4)生活质量测评系统。该子系统除包括 D·莫利斯在 1979 年建立的生活质量指数(PQLI)中的两个具有社会人文发展内涵的婴儿死亡率和识字率外(D·莫利斯,1979),还包括恩格尔系数、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及贫困人口比重下降的程度、城市化水平等指标。该系统旨在客观地反映国民在人口经济发展中的受益程度,以及全社会向贫困、不公平及腐败宣战取得的成果。根据上述亚洲多国模型的实际资料,这个发展阶段的上述五个指标的最高值和最低值具体量化为表 4。从表 4 亚洲多国模型可以看出,它比较客观地反映了部分亚洲国家,经济起飞时期有关人口生活质量的几个主要指标达到的总水平及其发展不平衡程度。

以上四组共计 21 个指标,就构成了人口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这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综合测评系统。各发展因素,例如现代人口转变、经济增长质量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等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其中由现代人口转变、人口素质与人力资源开发所形成的人口发展因素对

表 4 生活质量指标体系

指 标	亚洲多国(地区)模型	
	最高水平	下限水平
1. 婴儿死亡率(‰)	18.0	51.0
2. 成人识字率(%)	97.8	60.0
3. 恩格尔系数(%)	34.0	54.3
4. 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 ^①	0.45	0.2
5. 贫困人口比重下降的程度	—	—
6. 城市化水平(%)	60.0	21.0

注: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可用基尼系数表示。即:基尼系数= $\frac{\text{收入最低 } 40\% \text{ 人口收入比重}}{\text{收入最高 } 20\% \text{ 人口收入比重}}$

资料来源:同表 1。

整个人口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尤为深远, 它会使人口经济发展充满活力并推动可持续发展。因此, 上述四组主要指标, 可以作为衡量现阶段我国人口经济发展各主要方面现实水平的客观标准。利用各主要指标有机结合最后形成的综合测评系统, 就能够相对准确地测定人口经济发展的总进程与水平。

三、讨论与思考

下面我们再就如何科学地解决本测评系统的指标设定、测评指标同国际接轨以及它的具体应用条件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 本测评系统的基本出发点, 就是要对现阶段我国人口经济发展进程和现实水平进行定量分析与测评。其最终目的是力图使我们对复杂的人口经济发展过程, 能及时以最简明的量化比较方式把握它。特别是要较为具体地把握其不同年份(或不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达到的具体水平、基本走向及其突出问题, 为各级领导机构决策提供必要依据。

基于上述出发点, 本系统主要指标的设定遵循如下四个原则。其一, 是从中国当前的实际出发, 把人均 GNP300—600 美元发展阶段变化最典型的若干指标(如人口总和生育率、中学入学率、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非农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等), 设定为主要测评指标, 以求更深刻地反映中国现阶段的实际。其二, 是要反映国际标准并要有客观性。为此, 我们把日本、亚洲“四小”、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地区)相应发展阶段以及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水平, 作为各指标数据的选取范围, 从中确定某一指标的最高值和最低值作为座标。这样就使指标的界定更能接近国际平均水平, 更具客观性。避免只把个别或少数国家的发展水平作为参照系标准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其三, 依据人口问题实质就是发展问题的共识, 坚持把人口置于社会经济总进程中去考察, 把现代人口转变、人口素质与人力资源开发等同许多重要的发展因素联系起来, 从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去考察, 力求对人口经济发展做出客观的评价。其四, 测评系统的构筑要尽量简明、实用、易操作, 更贴近实际应用。为此, 我们把复杂的人口经济过程庞大而繁多的指标系统, 通过综合因素分析把它集中简化为最有代表性的现代人口转变、人口素质与人力资源开发等四个指标体系。

其次, 关于测评系统的指标同国际接轨问题。如上所述, 本系统各指标采用的标准是以亚洲若干国家(地区)在其人均 GNP300—600 美元发展阶段的大量历史资料 and 实际数据为基础, 并参照 90 年代我国人口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若干代表性的主要指标设定的。它既是以历史实际水平为座标, 从而能相对准确地测定一个国家(地区)在这个特定发展阶段不同年份所达到的相对水平; 又同现实国际平均水平有一定的可比性, 从而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它同现代国际平均水平的差距。因此, 这些测评指标能够反映人口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性。我们的研究也发现, 凡是人口经济发展取得较大成就的国家(地区), 在上述几个指标体系中, 其相关指标都得到相对准确的定位和良好的反映, 这就表明这些量化指标能够较为客观、准确地反映人口经济发展的具体进程。

以教育经费占 GNP 的比重这一指标为例。按照本系统测评, 我国 90 年代初仍处于很低水平, 其中最高年份的 1991 和 1992 年分别为 2.6% 和 2.5% (中国统计年鉴, 1996), 比“人口素质与人力资源开发”子系统中最低值的 2.2%, 只高 0.3—0.4 个百分点。而按照目前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IMP) 对参加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的 46 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报告, 中国公共教育人均支出 1996 年在 46 个国家中排名第 45 位 (赵彦云, 1997), 反映当前我国该项指标

同现代国际平均水平相比,也是处于很低水平上。二者的定位和趋势都是一致的。经验证本测评系统指标的设定是符合实际的,可以对研究对象作出比较合乎实际的测评。

再次,关于本测评系统的挑战性与应用条件问题。本测评系统指标的设定,其挑战性在于:每个主要指标的最高值一般都反映了这个发展阶段可能达到的最佳水平,从而它可以被视为理想水平。而且,这些历史的最高值,当代其他国家在进入该阶段以后,也只有极少数国家可能达到或超越这一目标。例如1994年全球50多个人均GNP600美元以下的国家中,只有阿塞拜疆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0%/1990—1994年),接近本测评系统中的最佳值0.9%,中学入学率(89%/1993年)等指标达到或超过这一目标(世界银行,1996)。可见这些指标的上限一般都需要经长时期努力才可能达到。因此,它具有现实的挑战性和先进性。而且,实践中越是准确把握住这些挑战性目标,越容易在相对较短时期内,达到较理想的高水平。

此外,使用本测评系统还必须注意它的应用条件和特点。其一,测评对象地区必须处于相应发展阶段。如果测评对象已超越这个发展阶段(例如人均GNP达1500美元),那么即使测评结果各指标都接近本系统诸指标的上限,也不能说明它处于理想的发展状态。其二,本系统的应用范围主要适于对人口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进行综合测评,并非对其全方位的评估。因为人口经济发展包括十分广泛、复杂和多层面的内涵,其中还包括诸如环境、安全、社会保障以及卫生健康等多方面的内容,而这些指标限于本测评系统的设定目的以及有些指标难以量化,都没有被列入。其三,应用本系统要有连续性,定期进行测评,才能使之发挥更大作用。因为这些重要指标可以及时反馈实践过程中的重要信息,具有区分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功能,可为领导机关提供咨询,从而促进及时抓住这些重要问题,集中关注亟待解决和发展潜力大的目标,采取必要的调整政策及时加以解决。如果没有连续性,就很难起到这种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 田雪原,1996,“人口、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张纯元主编,1996,《消除贫困的人口对策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洪英芳,1993,“经济增长质量与人口效应”,《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中国统计年鉴》,1996,第32、220页。
《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要》,1994《世界与人口》第11期。
《世界人口行动计划》,1984,墨西哥。
《世界发展报告》,1996,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190页。
西蒙·库兹涅茨,1989,《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M·P·托达罗,1988《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D·莫利斯,1979《衡量世界穷国的状况:物质生活质量指数》,伦敦弗兰卡斯出版社。
赫伯特·S·帕纳斯,1990,《人力资源》,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作者系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
责任编辑:王 颀